

十年一觉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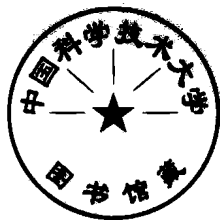
——
风云人物



十年一觉荒唐梦

——风云人物沉浮记

李 逊 编



目 录

乱世狂女

- 聂元梓……………艾群 1

乒乓启示录

- 记庄则栋在“文革”中……………关鸿 黄伟康 34

生与死的交响乐

- 记劫夫……………刘志清 赵建平 154

“柯湘”的沉浮

- 记杨春霞……………李南友 242

一个历史学教授的悲剧

- 记杨荣国……………钟健夫 252

历史的误会

- 记王国藩……………王立新 265

黑的人白的人

- 记孙玉国……………刘志清 321

十年一觉荒唐梦

- 记“学习毛著标兵”顾阿桃……………欧翔 容龙 357

一颗明星的沉浮

- 记“上山下乡”知青代表朱克家……………孙育鼎 372

“红”牌坊

- 记嫁给农民的女大学生白启娴……………丛聪 387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 记清华附中“红卫兵”卜大华……………梁梁执笔 398

乱世狂女

——聂元梓

艾 群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六天后，六月一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举动，在当时被认为是“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时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的评价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写得何等好啊！”

陡然间，聂元梓被举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成为神州上空一颗令人眩目的星辰。

然而，历史偏偏象莎士比亚作品那样富于戏剧性，十二年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武装民警向聂元梓出示了逮捕证，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将其逮捕，警车一响，锒铛入狱。接着是一次又一次审讯。又过了五年，一九八三年三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述同样罪因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四年。

就在报纸上登出对聂元梓的判决时，还有人以为她是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一样年轻的“造反小将”呢。其实不然。当年一张大字报震惊全国，广州市的红卫兵大辩论，一名中学生斥责一名大学生：“你算什么革命小将，人家聂元辛（他不认得“梓”字）才是革命小将呢！”于是他们一干

人登上大串连的列车，日夜兼程，慕名而来，要瞻仰聂元梓的青春风采。等赶到北京大学哲学楼这么一看，唉呀不好，那红卫兵小将惊诧得险些咬掉半个舌头——那“革命小将聂元梓”原来是个在镜片后面眯缝着一双黄眼的半老徐娘。那一年，她的大儿子已经二十岁了。

聂元梓一九二一年四月五日出生，属鸡，后来有人骂她是雌鸡报晓、阴阳倒置。一九七八年正式逮捕时她五十七岁，如果不发生意外，十七年服刑期满，她应该是七十四岁的高龄了。

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在文化革命中都干了些什么？

一、从滑县到北大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她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中等以上的文化教育。大哥聂真从小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兄弟姐妹先后投奔了革命。后来，聂元梓这些哥哥姐姐大都成长为我党的高、中级干部。

一九三四年，十三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那时候她是个活泼的小姑娘，热情，善良，追求进步。一九三七年七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为期一个多月。“牺盟会”即“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建于一九三六年九月的一个地方性群众抗日团体，它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引导，阎锡山也曾一度表示支持。青年聂元梓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一月，年仅十七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

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聂元梓被派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担任第一区的副书记；一九四七年二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处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一九六四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一九六五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时，四十二岁的聂元梓已经是行政十二级干部了。爆发文化革命那年，她四十五岁。

这是一份十全十美令人起敬的履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如果不是偏偏选中她来充当文化革命的马前卒，她或许会同中国上层社会其他四十五岁的妇女一样，安安稳稳地生活，当一名好干部，当一个好妻子，当一位好母亲，享尽天伦之乐，幸福圆满地了此一生。天晓得为什么历史的激流偏偏在这里打了一个漩涡，天晓得为什么偏偏把她高高地推上浪尖，又深深地卷入水底。

座落在北京西郊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被人们称为亚洲的最高学府。湖光塔影、亭台楼阁；古典建筑同现代化楼群交相辉映，犹如古典美人西施，换上了最时髦的巴黎时装。她的前身，是成立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她的历史，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的发展史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中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蔡元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文学家鲁迅等人，曾先后在这里任教任职。她的著称于世，还在于她是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与聂元梓同时任职的中文系系主任杨晦教授，就是“五·四”运动中第一个跳进院墙点火焚烧赵家楼的那位民主勇士。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拥有朱光潜、冯友兰、汤用彤、任继愈这样一批全国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在这样一座学

府中领导这样一个系。对于一直在外省的基层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的专业素养的聂元梓来说，确实力不从心。在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上，聂元梓竟然说出“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顿顿的静河》”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来。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常常语无伦次的女人。他在全校树起了五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赞誉“五朵金花”，与聂元梓这样的干部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此聂元梓颇不服气。

时间到了一九六四年底，北京大学进驻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认定陆平为首的校领导在教育路线上犯了错误。他们发动群众，揭开了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在这个过程中，聂元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倾吐了郁结在胸中的闷气，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每日从中美四三号家中出来上班，二六型自行车骑得特别带劲。根据同陆平“错误”进行斗争的表现，聂元梓成为工作队依靠的“左派”。

斗争气氛扩散到学生中间。寒假过后，一些班里发生了“政变”，部分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以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选了班干部。校园里散播着“陆平犯了路线错误”、“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这样的传闻。有几个“左”得可爱的学生，相继提出退学当兵或退学到农村落户的申请。

不料，好景不长。这个“社教”工作队被撤走了。北京市委领导的第二个工作队进驻北大，这个工作队对北大问题的看法同第一个工作队截然相反。导致的直接变化，就是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陆平的讲话。那一天晚上，在“五·四”运动场举行万人营火晚会，校长陆平登上高高的主席台。这是他自打第一个工作队进校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是解放前的北大学生，战争失去了一只眼，所以总戴着一副暗色眼

镜。他的举止具有关东大汉的粗犷风格，说话带着黑龙江的口音。一九四一年临解放北京时，他在张家口说了一个著名的笑话：“逃离北平时，在北大对面的饭铺里吃了两个烧饼没给人家钱。这回解放了北平，第一件事就是找掌柜的还烧饼钱去。”一九五八年，他由铁道部副部长上调到北大担任校长，党委书记。第二个工作队进校后，他得知中央负责同志对他的肯定。这天他在主席台上面对营火晚会上的千万师生，气势非凡地大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这话听到聂元梓的耳朵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似乎是向他们社教积极分子示威。

第二个工作队在国际饭店和民翼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组织与会干部学习，端正思想认识。会上，第一个工作队时的积极分子，很多人作了检讨。聂元梓在会上的发言也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但是后来她把别人对她的批评帮助说成：“国际饭店会议要把我搞成一个臭女人，我当时多伤心啊！”

对于国际饭店会议，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是这样说的：“陆平保皇党”对“革命左派”“残酷斗争，竟达七个月之久。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从国际饭店会议开始，聂元梓更加感到抬不起头来，她不想继续留在北大工作了。自从一九五九年同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之后，就一直寡居，有儿有女，没有再积极寻求婚配。这回她却积极拜托月老，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中监委常委吴××。人们议论，这是为调离北大做准备。

但是历史却做了另一种安排。

二、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是批“三家村”。学生停课，师生同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那时候的气氛，象大地震的前兆，令人晕眩，令人失态。

五月二十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了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一边用左手不停地揉着脸颊。她过去患过中风，心里一转圈，情绪一激动，脸上的肌肉就痉挛不已。

“到了，机会到了！”她窃喜道。

这是向校党委发难的绝好机会。

一个好汉三个帮。聂元梓把哲学系可信赖的人一个个在心里掂量。在国际饭店会议上能够同自己始终站在一起的“坚定的左派”，今天就能够同自己共图大事。

她找到哲学系党总支的一名副书记D，

她敲开二十三楼哲学系青年教师C的家门，

她时而骑车，时而步行，初夏的太阳照得她两额汗涔涔。

大家都有发难的愿望，可是又都认为此举非同小可，不应贸然行动，必须事先探好虚实。那么找谁去探虚实呢？谁具有手眼神通，能够指点迷津呢？

想来想去，聂元梓觉得只有去找她：曹轶欧。

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三月四日进驻北大蹲点，观察文化革命。她神秘的行踪，给北大带来不祥之兆。

聂元梓在延安时见过康生，并认识了曹轶欧。五十年

代，聂元梓在哈尔滨工作，当时她的第一个丈夫吴宏毅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想请上层人物过过目，点拨点拨。听说康生伉俪莅临哈尔滨，吴宏毅认为是个机会，就让聂元梓去走康生的门子。聂元梓带上剧本到宾馆找到曹轶欧，拐弯抹角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曹轶欧说：“把剧本留下吧。”剧本转到康生手里。对待艺术作品，康生是有名的神枪手，他枪毙起作品来，一枪一个，百发百中。聂元梓同康生没有特别的交情，吴宏毅的剧本自然也没得到康生的枪下留情。长春电影制片厂原打算列入拍摄计划，闻听康生枪响，自然也就原本奉还。

如果还是为了剧本这样的区区小事，聂元梓是不会硬着头皮再次求见的。她没有直接去找曹轶欧，她通过一个中间人把请求谒见的意思转达给曹轶欧。不久，就得到了曹的答复。

在北京大学南面约二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占地面积相当大的中国宫廷式建筑——西颐宾馆。聂元梓同教师C在中间人的带领下，上电梯，穿过铺着紫色地毯的楼道。他们敲开了一扇门，在豪华的住房里，曹轶欧已等候多时。

聂元梓亲切地叫了声“曹大姐”，双方就落座交谈。

聂元梓谈出了自己对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她认为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是北京市委的黑干将黑窝子，压制文化革命。说到这些，聂元梓翻开了她的笔记本，那上边记载着五月十四日陆平在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内容。陆平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等等。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聂元梓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自己发言，事先写草稿；别人发言，逐字逐句记录在案。这些材料，可以用于整人，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这是些大炮、机关枪，也是暗器、飞镖。

曹轶欧话不多，她侧过耳朵仔细聆听聂元梓不很精练的汇报，中间插入一句半句的，启发；暗示，点拨，策动。

“《五·一六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可以写大字报。”

.....

聂元梓认为，曹轶欧的话决不仅仅代表曹轶欧个人。后来历史证明，曹轶欧确实不仅仅代表她个人。

从西颐宾馆回来，聂元梓和教师C分头活动，他们先后找了党总支副书记D，找了青年教师B、A、E。加上聂元梓和教师C，总共六个人。聂元梓向这些人“吹了风”，透露了曹轶欧的旨意。她对北大、北京以及全国的政治形势作了一番分析，最后直截了当地表示：“写大字报，大字报来得快，可以引起注意。”

这六个人秘密集中在二十三楼教师C的家中，他们决定就从陆平五月十四日的讲话来开刀。聂元梓定调说：“这一回先写号召，以后再写具体问题。”接着，教师A写了第一稿。

参加第二稿讨论的还是这六个人。

五月二十四日晚，教师C执笔写出了第三稿。这一稿基本上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些内容。

大字报首先描述了北大文化革命的形势。“……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接着是对陆平五月十四日的讲话逐条逐句地批驳，毫不吝惜地使用问号和惊叹号。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

对不是！”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作梦！”

这里的“你们”，指的是大字报上点了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后来被迫害致死；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解放前是清华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她一边挨斗一边劳改搬运煤球，全家人被轰到东城区小雅宝胡同三十九号的一间小平房里，她本人不得回家。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这天晚上聂元梓看过三稿后，觉着还不带劲，掏出钢笔，在末尾又加上几句口号：“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应为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个“鬼计”一词一直到后来《人民日报》上发表，依然原封未动。

第二天是五月二十五日。一清早，教师A就敲开教师C的门，要来大字报底稿，送到聂元梓那里。聂元梓又一次过目。这时候六个人已经凑齐，用毛笔抄写清楚。聂元梓抄起毛笔，饱蘸墨汁，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余五人依次签名。在签名过程中，碰巧来了研究生F，经聂元梓动员，F也签上名。

这就是后来在广播中和报纸上发表的大字报的七名作者。他们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后来在这签名的六个伙伴中，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追随聂元梓的态度立场，其中杨克明、李醒尘最早站出来抵制聂元梓的行径。

中午一点，聂元梓主张把大字报贴出去，六个伙伴中有人提出别那么急，等两天看看气候再说。

聂元梓使劲地摇晃脑袋：“不行不行”。她执意要立即贴出，理由是：“明天是二十六日，按计划校党委要召开全校批判‘三家村’的大会。大字报一定要贴到他大会召开之前。否则，咱们指责‘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岂不不攻自破？”

事不宜迟。他们拎着浆糊，一溜小跑，来到大饭厅东墙下。

几分钟后，大字报贴到了墙上。

这时候，有人无意间抬头看了一眼大饭厅东墙上的大电钟，时针将要指向两点。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聂元梓并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会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那样恶劣的作用；也没有估计到这一张大字报竟决定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

大字报贴到墙上，呼啦一下子围上众多的师生。三小时后，五点钟，校党委组织的反击的大字报贴到聂元梓大字报的周围。晚间，聂元梓在五院哲学系开声讨会，一些师生拥到会场门口，指名道姓让聂元梓出来辩论，他们高呼：“现在已经不是下午的形势了。”“我们要找聂元梓算老帐！”会

议被冲散，聂元梓在伙伴的护卫下才得脱身。

第二天是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黄一然曾担任过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外交官职务，外交辞令烂熟于口。他娓娓动听地劝说聂元梓主动检查，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吟良久，仰起脸回答：“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事情越闹越大。分歧引起辩论，辩论引起推搡，推搡引起扭打。高云鹏挨了打。他们打电话给校党委，要求制止对他们的围攻。

事情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派张彦轩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这实际上是批评了聂元梓的做法。对此，聂元梓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陈伯达、戚本禹到北大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其他人都是可以反。伯达同志例外，其他人都是可以反。”聂元梓事后对他的亲信说：“再揪出一个大的，就是周总理。”

周恩来总理对聂元梓的看法也很明了：“北大有个女人，很坏。”

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一日，北大乱成一锅粥。其间，曹轶欧派人要走了大字报底稿，去策划更大的行动。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的原文，并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个举动不仅使北大师生感到意外，就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也感到意外非常，陈老总急匆匆去询问周恩来总理，这么

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总理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六月一日晚，北大师生在大饭厅收听那个广播。一些师生冲到台上高喊：“不要盲从！”“在三个小时之内把中央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这些天真的人们哪里知道此举有着深刻的背景。

六月二日，一直在幕后活动的康生终于走到幕前。他喜形于色地来到北大，雄赳赳东走西串。在三十楼和三十二楼之间的空场上，他操着浓重的山东腔向师生讲演：“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对于康生的这个评价，聂元梓听了吓了一跳。那几天，她知道事情闹大了，怕挨打，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六月一日一整天，她在医院里护理她的母亲。得知电台广播，又听了康生吓一跳的讲话，聂元梓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回总算干对了！她同她的伙伴弹冠相庆，每天接到千百封声援信，声援大字报，让他们喜不自禁。聂元梓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她象澳大利亚袋鼠那样，又重新挺直了腰板。

三、 第二次沉浮

“新华社三日讯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这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各大报纸刊登的头条消息。其

实，六月二日，新市委工作组就已经进驻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原本是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这位操着冀南口音的外省干部对聂元梓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进驻十多天，他没有认真听取聂元梓的意见。他完全按着自己善良的幻想，企图把运动纳入正常轨道。回答他的便是“六·一八”事件。

六月十八日，北大校园里突如其来地刮起一股乱揪乱斗的旋风，四十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被带上“斗鬼台”，揪上来，轰下去，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扣字纸篓，“喷气式”，游斗，以致个别女性被斗对象遭到猥亵污辱。张承先乘上小汽车象消防队员一样四处奔波，声色俱厉地制止乱斗。当晚，他发表了广播讲话，严厉地批评了乱斗行为。工作组的简报送到党中央。

这一阵子聂元梓蒙受着一种难以忍受的冷落感。她密切注视着“六·一八”事态的发展。当一些学生请教她的见解时，她毫不隐晦地表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红色恐怖”万岁，北大工作组右倾。她的态度不胫而走，私下里传遍了燕园的犄角旮旯。工作组有所耳闻，但是他们不为聂元梓的态度所动。

七月底，正是最炎热的日子。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在校园里寻凉的师生中有人发现，一串黑色的高级轿车驶进北大，从车门钻出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人。他们通知师生，到东操场召开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

工作组事先并未接到通知。江青一行的突然袭击，打得工作组措手不及。他们仓促赶赴东操场。

东操场体育馆对面是未名湖，湖边有一些山石树丛。到这个时候还蒙在鼓里的工作组长张承先，在树丛中单独同一名工作人员谈话，神色紧张地揣度江青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

药。就在他困惑、焦急地徘徊时，聂元梓已被请上了主席台就坐。

康生主持会议，他的山东腔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他让师生辩论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他时不时地宣布：“这里有人递了个条子……”康生念的条子都是符合他口味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他每念一个条子就引出一阵激烈的辩论。

聂元梓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江青。只见江青今日格外活跃，她一把扯过一个戴眼镜的矮胖，一扬手摘掉那人的解放帽，露出那人毛发稀疏的大脑袋。江青用手指点着那个大脑袋就象祖母摸弄着三岁儿孙，她使着“云遮雾”的嗓子酸声酸气地介绍：“看一看，这就是咱们的老夫子伯达同志。”

陈伯达曾要求北大取消中国语言文学系，理由是“中国人还用学中国话吗？”可是这一天陈伯达这个中国人却让王力给他作翻译，他说一句，王力翻一句。陈伯达是福建人，普通话总也学不会，大多数中国人都听不懂他的话。

一阵乌云飘来，淅淅沥沥洒下一阵雨。工作组连忙撑起雨伞送到江青身边，打算替江青打伞。江青刚才还诉说自己浑身是病，抱怨别人对她的健康进行迫害，这会儿却一反常态，抡胳膊就把雨伞打掉，气咻咻地伸直脖子喊：“我们不怕雨，我们没那么娇贵。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后来这句话发展成：“要革命的往前站，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蛋滚他妈的蛋！”

康生与江青历来配合默契。此时康生火上浇油地一拍桌子，瞪圆眼珠子咋唬：“张承先，你站起来！”

这二人一唱一和地嚎叫倒不打紧，红卫兵被煽动得发了狂。只见北大附中的一个女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抡起皮带，照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劈头盖脸的抽打起来，可怜这位五十